

# 「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

• 王 柯

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思想史上的最重大事件，莫過於民族主義的傳入。即使在時隔一百年後的今天，民族主義仍對中國有着強烈的影響。

當年，在滿清統治的王朝基礎上議論建設新中國，理論上首先要解決的當然是如何處理「國家」與「民族」之間關係的問題，這是民族主義進入中國的思想原點。檢討中國早年民族主義思想時脫離了這一原點，不僅會誤解先哲們當年打造民族主義之本意，更會看不清一百年來民族主義給中國帶來的利弊，尤其是無法正確回答民族主義在今天帶來的現實問題。

## 一 「民族主義立國」與「民族建國主義」

中國最早使用「民族主義」一詞的應是梁啟超先生。1901年，他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根據德國政治學者伯倫知理 (Johann Caspar Bluntschli) 的國家學說指出，世界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開始進入民族主義和民族帝國主義的時代，到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更邁進民族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時代。梁啟超覺察到民族主義思想在建設近代國家中的重要意義，他形象地比喻道：「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段者，不得謂之為國；譬諸人然，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比不可缺之材料也。」民族主義「猶未胚胎」的中國，想要抵抗已進入到民族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階段的歐美列強的侵略，只有加速培養「民族主義」：「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sup>①</sup>從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梁啟超之所以注意到民族主義，是出於考慮中國如何才能夠在弱肉強食的國際政治中生存下去的目的。

在梁啟超民族主義的視野裏，並非沒有國內的民族問題。1902年4月，他在致康有為的信中說道<sup>②</sup>：

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不能棄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日本以討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

中國最早使用「民族主義」一詞的應是梁啟超。他認為想要抵抗歐美列強的侵略，只有加速培養國民的「民族主義」：「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他之所以注意到民族主義，是出於考慮中國如何才能夠在弱肉強食的國際政治中生存下去的目的。

梁啟超清楚地表明了一種「以民族主義立國」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將「討滿」與「討幕」相提並列，這就說明其民族主義的目標是在中國推翻清王朝，而並非從中國驅除其他民族。

但是在梁啟超之後，更多的思想家從國內政治的角度注意民族主義。發表於1903年3月《浙江潮》第一期上的〈民族主義論〉，對民族主義下過這樣一個註解：「合同種異異種，以建一民族的國家，是曰民族主義。」<sup>③</sup>由於他們民族主義的視線集中在國內政治上，於是便發現了作為文化共同體的「民族」向政治共同體的「國家」過渡的必然邏輯，民族主義更被具體為建立民族國家的「民族建國主義」<sup>④</sup>：

民族之所由生，生於心理上道德與感情之集合。因道德與感情之集合，而興起政治組織之傾向；因政治組織之傾向，而民族建國主義乃星回日薄於大陸之上。……今欲存支那者，不可不集合支那民族以自相提攜、自相固着，集合皇漢民族以自相提攜、自相固着，不可不言民族建國主義。

在中國國內政治的層次上區別「民族」，當然只有漢族或非漢民族；提倡民族建國主義，當然就是建設一個漢民族的民族國家。流行於這一時期的復仇說、光復說、獨立說、黃帝子孫說等民族主義諸說，其實質都是民族建國主義。民族建國主義，其實是主張以革命形式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家的共同思想特徵。

無論是民族主義立國，還是民族建國主義，都圍繞着「民族」與「國民」二詞大做文章。這說明，二者都認為中國想要強大就必須走建設國民國家(nation state)的道路，而在他們理解的國民國家的理論框架上，「國民」與「民族」之間具有相輔相成的關係。

國民國家是與君主專制(absolute monarchy)相對應的概念，國民國家理論的核心，是人民支配國家主權，即主權在民；因此，國民國家的主體不是政府，而是「國民」，作為集合體的「國民」對國家有權利有義務，作為獨立人格的「國民」互相之間自由平等。對於「國民」概念，中國近代的許多思想家都有着相當正確的理解。例如，1901年6月出版的《國民報》第二期中有〈說國民〉一文如此解釋國民<sup>⑤</sup>：

何謂國民？天使吾為民而吾能盡其為民者也。何謂奴隸？天使吾為民而卒不成其為民者也。故奴隸無權利，而國民有權利；奴隸無責任，而國民有責任；奴隸甘壓制，而國民喜自由；奴隸尚尊卑，而國民言平等；奴隸好依傍，而國民尚獨立。

近代以來世界各國之所以競相建設國民國家，就是因為可以通過這個過程使民眾不僅具有「參預國政之權利」，而且知道「一國之事即一人之事，一人之事即一國之事」<sup>⑥</sup>，從而增強民眾的國家意識，因之達到增強國力的目的。所以，梁啟超云：「國家所最渴需者，為國民資格。」<sup>⑦</sup>鼓吹革命者亦云：「夫立國於地球之上者，無國民則亡，有國民則強。」<sup>⑧</sup>在當時的思想家中，「中國自開國以來，未嘗有國民」<sup>⑨</sup>，則成為一種共識。

在梁啟超之後，更多的思想家從國內政治的角度注意民族主義。他們發現了作為文化共同體的「民族」向政治共同體的「國家」過渡的必然邏輯，民族主義更被具體為建立民族國家的「民族建國主義」。無論是民族主義立國，還是民族建國主義，都認為中國想要強大就必須走建設國民國家的道路。

所謂「中國無國民」，指中國民眾既沒有獨立人格上的自由和平等，更沒有對於國家之權利。梁啟超以此為近代民族主義發生之原因<sup>⑩</sup>：

(盧梭等)平權派之言曰：人權者出於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權，人人皆平等；國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結契約而成立者也，故人民當有無限之權，而政府不可不順從民意，是即民族主義之原動力也。

梁啟超顯然沒有解釋清楚「民意」與「民族主義」之間的互動關係，而提倡民族建國主義的革命家卻能夠明確指出中國無國民的原因在於清朝的民族政權性質。例如，汪精衛認為，在清朝對中國260年間的「貴族政治」體制下，「滿族漢族其權利義務之不相同」<sup>⑪</sup>，「一公權之不平等，二私權之不平等」<sup>⑫</sup>。

民族建國主義者普遍認為不平等的產生與「民族」有關。因為民族不同，所以利益不同，故多民族國家的統治者不能讓各個民族都享有平等權利：「政府者，所以為國民謀公益者也，所以拒他民族之妨我民族之權利者也。」<sup>⑬</sup>因此，被壓迫民族要取得平等的地位，就要有自己的民族國家。1905年當時緊緊追隨孫中山先生左右的汪精衛，就曾在《民報》第一期發表〈民族的國民〉，大聲疾呼：「吾願我民族實行民族主義，以一民族為一國民。」<sup>⑭</sup>

總之，民族建國主義者常常將「國民」與「民族」合二為一。楊度說：「國民云者，對外族而言之也。」<sup>⑮</sup>從這種甚至不惜以區別或委棄「異族」的行為中可以看出，所謂的民族建國主義，不過是誤解「國民」必須以「民族」甚至是「種族」為基礎，因而為了打造「國民」而提倡的一種削足適履式的民族主義<sup>⑯</sup>。

提倡以民族主義立國的梁啟超，則不以驅除異族為建設國民的唯一途徑，認為一國之中的民族是否不同，與是否實現民主政治兩者之間沒有必然聯繫。為此他曾對民族建國主義提出質問：「排滿者以其為滿人而排之乎？抑以其為惡政府而排之乎？」梁啟超反對只有建立漢族民族國家才能挽救中國的說法，提出<sup>⑰</sup>：

自今以往，中國而亡則已，中國而不亡則此後所以對於世界者，勢不得不取帝國政略，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

梁啟超在這裏所提的「帝國」，是他依據德國政治學者的國家學說提出的一種民族主義高級形態，所以「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的「大民族」，就是他心目中「國民」的最理想形態。梁啟超之所以能夠「發現」一國之內可以存在着兩種不同層次上的「民族」（尤其是與國家同方圓的「大民族」），說明他也相信必須在「民族」的基礎上打造「國民」。

可以說，民族建國主義更加注意民族的內涵，而民族主義立國論更加注意民族的外延。儘管二者就民族的理解不同，然而可以看出，其實雙方的民族主義理論在構造以及最終目標上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都主張以民族主義喚起國民，都主張以民族為基礎打造國民，而最終的目標都是要實現一個「民族」與「國民」一致的國家。這個國家，正是英語中的nation state，它從「國民」的角度翻譯就是「國民國家」，從「民族」的角度翻譯就是「民族國家」。按照國民國家理論的思想框架，將「民族」與「國民」的概念聯繫在一起，正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的重要標誌。

民族建國主義注意民族的內涵；而民族主義立國論注意民族的外延。儘管二者對民族的理解不同，然而雙方都主張以民族主義喚起國民，都主張以民族為基礎打造國民，最終的目標都是要實現一個「民族」與「國民」一致的國家。將「民族」與「國民」的概念聯繫在一起，正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的重要標誌。

## 二 日製漢詞「民族」的深層意義

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思想家關於民族主義的文章，幾乎無一例外都誕生於日本。決不偶然的Made in Japan by Chinese (由中國人於日本製造) 的現象，說明中國與近代「國民」概念發生聯繫的近代民族主義的誕生，與日本的近代思想有着密切關聯。

日語中的「民族」一詞來自於英語的nation。在日本自由民權運動(1874-90)早期的政治小說中，Assemblée Nationale (國民議會)，就被譯為「民族會議」；然而，除此以外，有一項研究指出<sup>⑩</sup>：

在明治前半期中，幾乎看不到「民族」一詞出現……「日本人」一詞也首先意味着日本國政府統治下之「民」，「國民」一詞作為nation的譯文使用，也只是被當成一種應該形成的存在。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明治前期還沒有形成今天的日本人日常使用的「民族」的概念。

Nation之所以既可以譯為「民族」，又可以譯為「國民」，是因為它從詞根上看具有政治與文化的雙重內涵。近代意義的nation最早產生於法國革命時期。法語中的nation，首先指由信奉自由、平等、博愛理念的人共同組織起來的政治共同體，民族和文化意識只是第二次元上的問題。

也就是說，日本人首先是從「國民」的角度開始接受英語中nation的概念，然後又從「民族」的角度對nation進行了再認識。

Nation之所以既可以譯為「民族」，又可以譯為「國民」，是因為它從詞根上看具有政治與文化的雙重內涵；然而，從個人與政治共同體關係的角度來看，近代以前的nation，充其量不過是「國人」，而不是「國民」。近代意義上的nation，最早產生於法國革命時期。1789年法蘭西第三等級跳過路易十六獨自召開「國民議會」，公布人權宣言，所以法語中的nation，首先指由信奉自由、平等、博愛理念的人共同組織起來的政治共同體，民族和文化意識只是第二次元上的問題。但在德國以及中東歐國家構建國民國家的過程中，nation被視為一個具有共同人權、語言、宗教、文化、歷史起源特徵的單位。

德語中類似英語nation的詞彙叫volk。Volk在近代以前只是對軍士和社會下層民眾集團的蔑稱，在十八世紀末以後建設國民國家的過程中，與法國革命理念中提出的nation的內涵恰恰相反，volk變成了一個更近似於「民族」、首先指以共同語言為基礎而歷史形成的具有自我特徵的文化共同體的概念。而法國在革命以前不僅不存在這一意義上的nation，甚至不存在一個成為nation基礎的全國通用語言，今天的法語在當時不過是一種方言。

西歐與中東歐因為國情不同而採取了不同的nation形成方式。一般說來，中東歐以血緣為媒介，西歐以地緣為單位；中東歐重文化，西歐重政治。因此中東歐的nation更接近「民族」，西歐的nation更接近「國民」(公民)。然而，各個國家的nation的成立，都與近代國家(state)、市民或公民(citizen)、共同語(the common language)等概念的形有密切關係，所以不論是nation或volk，最終都成了「具有共同民族性的國民」或「具有共同國民性的民族」。但是應該注意的是，他們之所以能夠順利形成nation的最主要原因，還在於選擇了一條適合於自己的道路。試想如果法國走從文化共同體到政治共同體的道路，德國走從政治共同體到文化共同體的道路，那麼可能就不會有今天的法國與德國。

日本人開始意識到nation的概念，與十九世紀下半期遭遇西方列強有關。「佩里(Matthew C. Perry)來航」以來，為了對抗歐美列強的軍事威脅，日本人

意識到打破封建的幕藩體制和身份制，將全國各個階層的人民結合成一個同質的、具有共同歸屬意識的nation的重要性——「迅速建立一個與國家相關的nation」<sup>①</sup>，這就是明治維新的實質。

日語中原本沒有可以同時表達nation的政治共同體(即「國民」)和文化共同體(即「民族」)這一雙重意義的詞彙<sup>②</sup>。日本近代史上nation意識的形成過程，實際上可以分為「國民」與「民族」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基本上與在國民國家構想、民眾政治參加等問題上和政府相對抗的自由民權運動(1874年始)同期。在這一時期，人們比較重視政治的側面，所以當時的nation意識實際上是「國民」。雖然明治政府追求德國模式建設國民國家，從服從國家的意義上強調「國民」<sup>③</sup>；然而受到法國革命「天賦人權論」影響的自由民權運動，卻從自由、平等的意義上強調「國民」。福澤諭吉1874年的《勸學篇》(《學問のすすめ》)指出：「日本只有政府，沒有國民」；「按照福澤諭吉的說法，明治國家別無其他，只是在追求作為『政府的玩偶』的『國民』」<sup>④</sup>。1887年《國民之友》創刊，該雜誌使「國民」一詞開始在日語中廣泛使用並固定下來。創刊人德富蘇峰(1863-1957)曾明言刊名來自美國雜誌*Nation*，當時正是自由民權運動的退潮期，他從民主主義的角度高度評價了明治初期以來的製造國民的運動<sup>⑤</sup>。

第二階段與反對表面化和形式化的歐化主義、主張維護發揚日本優秀傳統的國粹主義運動(1888年始)同時開始。在這一時期，因為國粹主義雜誌《日本人》和報紙《日本》的宣傳，廣大日本人開始從「民族文化」的角度再次發現nation<sup>⑥</sup>。國粹主義認為國粹是一種源於獨自歷史和文化傳統的事實存在，作為它的具體體現，提出了「民族」的概念。國粹主義的實質，就是希望通過「民族」概念，強調日本國民具有別於他國的共同歷史和文化傳統、日本是一個以共同的歷史文化為基礎構建起來的政治共同體，以達到強化日本國民的愛國主義精神的目的<sup>⑦</sup>。所以國粹主義一般又被稱為日本主義。

國粹主義的代表人物為志賀重昂(1863-1927)、陸羯南(1857-1907)、三宅雪嶺(1860-1945)等人。志賀重昂1888年4月在《日本人》的發刊詞中直言國粹就是nationality(國民性、民族性)，他在《日本人》第二期上進而解釋道<sup>⑧</sup>：

這裏所說的國粹，就是順應日本國土中萬物自然的感化及化學反應，因此受胎、出生、成長、發達，於大和民族中千古遺傳、醇化下來保存至今的東西。

陸羯南於1889年創辦報紙《日本》，他也說道<sup>⑨</sup>：

同為人類，但人類有白人黑人之別、黑人黃人之別。黃黑白之中還有各種國家的各種民族。各種民族和各種國家都有自己的特有的歷史、特有的性格、特有的利害、特有的風俗、特有的領土。

可以看出，由國粹主義者傳播開來的「民族」，其實就是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日本國民」之「民」與作為文化、血緣共同體的「大和民族」之「族」的結合；他們之所以提起「民族」，就是為了從文化和血緣的側面更加強調日本nation的一體性。換而言之，「民族」一詞之所以能夠在日本這樣一個民族成份單純的國家裏產生並流行，就是因為它可以強化日本國民中「一個國家就是一個民族」的思想。

日本近代史上nation意識的形成過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與自由民權運動同期，人們比較重視政治側面，所以當時的nation意識實際上是「國民」；第二階段與國粹主義運動同時開始。國粹主義通過「民族」概念，強調日本國民具有別於他國的共同歷史和文化傳統，強化日本國民中「一個國家就是一個民族」的思想。

### 三 日本國粹主義下近代中國的「民族」理解

從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家都是在國民國家理論的思想框架上認識「民族」這一點上可以知道，中文的「民族」一詞，就是在近代借自於「同文」之國的日本。

最近有人指出，中文裏出現「民族」一詞的歷史，至少可以上溯到1837年中國境內第一份期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37年，普魯士傳教士郭士立[Karl Gützlaff]主編)九月號上〈約書亞降迦南國〉一文中的「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陸路渡約耳但河」<sup>②</sup>。然而，無論從文章涉及對象的存在年代來看，還是從文章自身表達的意義來看，這裏的民族都沒有「國民」的內涵。也許是一種先驗論的設想：「民族」一詞當時之所以沒有普及，是不是因為沒有與「國民」思想發生聯繫有關？因為當時的中文即使沒有「民族」一詞，也能通過其他手法表達該文中通過「民族」所表達的概念。

又有人說，中文中具有「國民」意義的「民族」一詞，出現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亡命以及大量留學生登陸日本之前的1896年。該年1月的《強學報》第二期〈論回部諸國何以削弱〉中有云：「夫國之易治者，莫如君權之獨擅也，莫如民族之順命也，而竟受制於英法之議院，有識者可以思矣。」<sup>③</sup>但是將這個「民族」作為一個詞彙有牽強之處，如果考慮當時奧斯曼帝國以及其他伊斯蘭教國家的內部構造，更能感到它可能表達了「臣民」與「部族」兩個概念。即使該文的確將「民族」當作了一個名詞，也知道它運用得並不純熟，其原因很可能在於它是一個日製漢詞，就像文中的「有識者」那樣。

1896年8月9日創刊的《時務報》中也陸續出現「民族」一詞<sup>④</sup>。有人以它為「民族」由日本傳入中國的證明<sup>⑤</sup>。然而論者都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時務報》中出現「民族」一詞的文章，大多刊登於從8月29日第3卷起開闢的「東文報譯」一欄，該欄專門登載日本報刊譯文，而負責為該欄目尋找原稿並譯成中文的，一直是一位「中東文兼精」、名叫古城貞吉的日本人<sup>⑥</sup>。所以說《時務報》中的「民族」，可能還算不上是中國製造。

毫無疑問，正是因為「同文」的緣故，使中國人在十九世紀末接觸並開始接受日製漢詞「民族」<sup>⑦</sup>。然而，「民族」一詞開始普及並在中文中固定下來，還是要等到與「國民」概念結合之時。從〈民族主義之教育〉一文可以知道，中國近代思想家之所以能夠不覺彘扭地主動接收「民族」一詞，不僅因為漢字相同，而且是因為與日本的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產生了共鳴。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近代思想家開始大舉登陸日本之日，正是日本國粹主義流行之時，一些日後成為民族主義思想家的人物，許多都與日本國粹主義者有過實際的接觸。例如，1898年2月3日，當時的眾議院議員犬養毅特意寫信給陸羯南，託他代自己照顧上年8月來日本的孫中山<sup>⑧</sup>：

持呈函之平山周氏現與孫逸仙氏同寓一處。……弟刻下臥病中，諸事不能兼顧。與神鞭君磋商結果，務請吾兄代為照顧彼等一切。

1898年10月17日梁啟超亡命日本，他在26及27日就與志賀重昂連續兩天見面，筆談如何通過日本「助我皇上復權」<sup>⑨</sup>。可以想像，通過這些交往，中國思想家對志賀重昂、陸羯南的國粹主義必定有所了解，此後也會注目於他們的思想動向。

毫無疑問，正是因為「同文」的緣故，使中國人在十九世紀末接觸並開始接受日製漢詞「民族」。然而，「民族」一詞開始普及並在中文中固定下來，還是要等到與「國民」概念結合之時。中國近代思想家之所以能夠主動地接收了「民族」一詞，不僅因為漢字相同，而且是因為與日本的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產生了共鳴。

尤其是經歷了戊戌變法失敗的梁啟超，為了尋求救國真理，一到日本就開始努力汲取各種新的社會科學知識。他在〈三十自述〉中如此回憶自己初渡日本時的情景：「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與橫濱商界諸同志，謀設《清議報》，自此居日本東京者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為之一變。」<sup>⑥</sup>這裏提到的農曆九、十月間，正是他接觸日本國粹主義首領志賀重昂的時期。

正是通過國粹主義的階段，以「民族」一詞在日語中得到普及為標誌，日本社會才完成了「一個國家就是一個民族」的思想建構；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家來到日本，並且與日本國粹主義者有了直接的思想交流。這一點，在解釋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家之所以追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及孫中山之所以要在中國實現一個漢族的「民族國家」的問題上，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 四 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神話與中國的「民族國家」思想

國粹主義雖然批判政府不顧日本實際盲目歐化，但是在強調天皇萬世一系及日本國家體制的優秀及永久性上，它與「國體論」一脈相承，在攻擊天賦人權論上比「國權論」毫不遜色。這種以國家為根本、將天皇制作為日本精神真髓的國粹主義，實際上是受到了德國近代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強烈影響。因為德國與日本同為君主立憲制，所以對於「國體論」和「國權論」來說，比起西歐的市民社會，德國的近代思想更具有吸引力<sup>⑦</sup>。

更加注意德國等中東歐國家的近代思想，也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家在日本文學時期留下的共同思想軌跡。例如，楊度1902年就曾說道<sup>⑧</sup>：

十九世紀，實為民族國家發生最盛之時代。其民族不同者，則獨立為一國，如意大利之獨立，希臘、羅馬尼亞之獨立是也；民族同一也，則結合為一國，如德意志聯邦，意大利統一也。

楊度所說的「民族國家」就是nation state。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思想家，能夠在言及中東歐的國民國家形成時將nation理解為「民族」，與日本國粹主義者和國體論積極推崇德國式的近代化有關<sup>⑨</sup>。

說到德國的近代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思想對日本的影響，就要提及兩位著名的國體論者——加藤弘之（1836-1916）與穗積八束（1860-1912）。加藤弘之還是鼓吹國家形成必須植根於民族文化，以民族為基礎的鼻祖。

（加藤弘之）在明治前期已經開始使用「族民」、「民種」、「種族」、「國民」等名稱來表達今天的「民族」才是國家形成主體的意思。認為明治國家也應該像德國和意大利的國家統一過程一樣，認為國家的形成必須植根於『民族』的傳統與文化，必須以獨自的「民族」的力量為前提的思想<sup>⑩</sup>。

他按照達爾文進化論描述了一個民族的世界，認為民族的能力來源於各民族對於自身民族特性的自覺和發展，只有具有政治能力的民族才可以建設自己的國家。

加藤弘之的思想給後來到日本的中國思想家以很大的刺激。例如1903年3月《大陸》第四期上的〈中國之改造〉一文，其中有「無組織機關之能力之民族則必不

日本著名國體論者加藤弘之強調，國家形成必須以民族為基礎。他按照達爾文進化論描述了一個民族的世界，認為民族的能力來源於各民族對於自身民族特性的自覺和發展，只有具有政治能力的民族才可以建設自己的國家。梁啟超關於國民與民族之間關係的思想基本接受了加藤的觀點。

中國的民族建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建國論者，原本都希望通過「民族主義」喚起「國民」、以「民族」為基礎打造「國民國家」，但在具體的實踐上卻將最終目的變為尋找和打造「民族」和「民族國家」。發生這種倒錯的原因，就在於日製漢詞「民族」給「同文」之國的人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打造「民族」就是打造「國民」，就是構建近代的「國民國家」。

能組織國家，亦不能成國民之資格」一語<sup>④</sup>，可以說與加藤弘之的民族思想如出一轍。加藤弘之主要是通過翻譯立足於國家主義的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的文章表達自己的觀點。看梁啟超1901年所著〈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和1903年所著〈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就可以知道，他基本上是參照了加藤所譯。從〈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中的「論國民與民族之差別關係」一節更可以知道，他關於國民與民族之間關係的思想基本接受了加藤的觀點。

除了加藤弘之之外，留學德國五年、回國成為「明治法學界之重鎮」的穗積八束的名字也經常出現在梁啟超的著作中<sup>⑤</sup>。梁在日本很重視法制研究，1899年他剛到日本就寫下了〈各國憲法異同論〉、〈立憲法議〉等文章，1902年的〈答某君德國日本裁抑民權事〉一文，背景中日本延期實施民法的主角就是穗積八束。他在1904年的〈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及〈論中國成文法編制之沿革得失〉、1905年的〈開明專制論〉中數次提及穗積八束及其兄穗積陳重<sup>⑥</sup>。甚至有人攻擊說，梁啟超關於議會政治的論說不過是照抄穗積八束的文章而已<sup>⑦</sup>。

近代日本尤其在法制史上受到了德國的影響。1892年，穗積八束將「國體」與「民族」結合起來進行闡述，他強調日本之所以實現了國家和社會的團結，是因為君主（天皇）萬世一系沒有變易；而能夠做到天皇萬世一系，就是因為天皇為「民族的宗家」，所有日本人為同一個祖先之後，同奉一個「祖先教」，同為一個「民族」<sup>⑧</sup>。穗積八束認為，「愛國公同的精神」才是國家與憲法的基礎，而這種精神產生於「我們民族同族同血類」<sup>⑨</sup>。從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黃帝說、漢種說等等民族主義思想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同祖同族」的血統論民族說的影子。

到了1902年穗積八束進而將民族、國民和國家三者合一，主張國家就是「具有一定的土地、一定的民族、以及具有最高主權進行統治的團體」<sup>⑩</sup>。以「民族」等同「國民」、代替「國民」的觀點雖然妨礙了日本民主主義的進步，然而近代日本的民族概念，依據德國學者的學說變成一種血緣共同體的概念，並且通過國體論滲透到國民之中<sup>⑪</sup>，國粹主義、尤其是加藤弘之、穗積八束的思想使日本人更加相信日本是「單一民族國家」的神話<sup>⑫</sup>。

無論是中國民族建國主義者設想「一個民族為一個國家」而主張排斥異族，還是梁啟超等民族主義建國論者設想「一個國家為一個民族」而提倡同化異族，實質上他們都是在尋找一個「單一民族國家」。「顧國民云者，以國家為民族之範圍。」<sup>⑬</sup>他們在總體的理論上原本希望通過「民族主義」喚起「國民」、以「民族」為基礎打造「國民國家」，但在具體的實踐上卻將最終目的變為尋找和打造「民族」和「民族國家」。

發生這種倒錯的原因，就在於二十世紀初年日製漢詞「民族」給「同文」之國的人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打造「民族」就是打造「國民」，就是構建近代的「國民國家」。關於這一點，孫中山先生日後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篇仍可以看作是最好的註解：

哪遜(nation)這一個字有兩種解釋：一是民族，一是國家。……一個團體，由於王道自然力結合而成的就是民族，由於霸道人為結合而成的便是國家。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出版的《新民族論》主張<sup>⑭</sup>：

美利堅只有國民而沒有民族，德意志只有民族而沒有統一國民；……唯有我日本理想地將民族與國家、文化與政治完全一致地結合在一起。

從這種盲目的優越感中可以看出，直到二戰結束之前，日本人將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文化共同體與政治共同體完全等同，按照「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框架來理解國民國家。

直到今天，大多數日本人對於「民族」概念的認識實際上仍然極為抽象。這是因為出於偶然，日本人生活在一個與他國交往被限制的島國之上，這裏從古代就在無意識中形成了國家與民族幾乎重合的一種環境，所以許多日本人都單純地相信日本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都以為「日本人」就是使用「日本語」的「日本民族」（或稱「大和民族」）<sup>②</sup>。對於生活在這種特殊環境中的大多數日本人來說，以血緣為基礎的文化共同體的民族＝國民，乃是一種天經地義的自然事實。正是在這種思維邏輯的背景下，產生了日製漢詞的「民族」。

可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多民族國家，如果按照文化共同體等於政治共同體、民族等於國家的邏輯，無數國家只能無休止地分裂下去。對於中國來說，接受日製漢詞「民族」的錯誤，不僅僅在於「民族」過份強調了nation的血緣和文化屬性，更在於由日本人在「單一民族國家」的背景上解釋nation文化屬性的行為，給中國的近代思想留下了「一個民族就是一個主權國家」以及「相同的國民必須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的烙印。

登陸日本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家，因為只有救中國的熱情而沒有深入了解日本的欲望，就在不知道日本是在強調了nation為「國民」之後才強調nation是「民族」這段歷史的情況下，便憑藉對日本的一知半解，囫圇吞棗般地吸收了「民族」的理論。梁啟超儘管有其超人的地方，看出保全國家不分裂就要走先國家、後民族的道路，可是因為也拘泥於「民族國家」，以至於到頭來連「民族」究竟是文化的共同體還是政治的共同體都沒有說清。

日本人生活在一個與他國交往被限制的島國之上，對他們來說，以血緣為基礎的文化共同體的民族＝國民，是天經地義的自然事實。而對於是多民族國家的中國來說，接受日製漢詞「民族」的錯誤，在於這種由日本解釋的nation給中國近代思想留下了「一個民族就是一個主權國家」的烙印，這就為追求「民族國家」的中國留下無窮後患。

## 五 結語：告別「民族」

經過十年論戰，新生的中華民國給國家與民族之間的關係開了一個「五族共和」的處方。事實上，就是在當時，這也不是每個民族主義思想家都能甘心接受的結論。孫中山先生就明確擺出自己是漢族領袖的姿勢<sup>③</sup>：

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為布告大漢同胞事：……此必我黃帝列聖在天之靈，佑助我同胞，故能成此興漢之奇功，……唾手燕雲，復仇報國，直抵黃龍府，與同胞痛飲策勳，建立共和國，使異族帖耳俯首。

中華民國元首透過悲壯歷史抒發出的心聲，原來是一個漢族領袖對漢族「民族國家」的執着追求。

由於受到近代國民國家就是由一個民族單獨構成的「民族國家」的影響，許多政治家都在理論上首先通過強調民族來構築他的國家理論。例如，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其原因應該是他們認為近代國民國家就是民族國家。孫中山先生贊同「五族共和」不過是權宜之計，包括袁世凱，其實都計劃實行強制性的民族同化<sup>④</sup>；蔣介石也宣稱中國只有一個民族，其他都是宗族。自從民族主義傳入中國以來，中國國家的民族主義目標，實際上變成如何打造一個單一民族國家。

然而中國因追求「民族國家」，卻為自身留下無窮後患。因為以日本國粹主義運動和國體論為背景產生的日製漢詞「民族」，首先讓人們更加意識到它是一個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文化共同體的概念。孫中山先生當初追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後來卻不得不改口說中國一個「國家」中存在兩種「民族」（中華民族、漢族等五族）的故事，就是這種意識與中國多民族國家現實發生衝突的真實寫照；其次是因為「民族」原是從翻譯nation而來，這一點也會授人以分裂中國的藉口。讓我們這樣設想：如果當初不借用日製漢詞「民族」的概念，而接受法國革命的nation概念——即一種政治共同體的概念以及以這種政治共同體為基礎形成的文化共同體概念，並以其他術語另外表示類似漢族、滿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那樣的以血緣為基礎的文化共同體的概念，那麼還有沒有日後的作繭自縛？

即使「民族」的原產國日本，日後也走到了尷尬地步。作為對國家主義歷史的反省，日本在戰後忌諱使用「民族」<sup>⑤</sup>。當日本再次走進國際社會面對世界各國多為多民族社會現實的時候，日本學者就開始不斷發現「民族」的弊病。有人公言：「在先人們將這個詞譯為『民族』時，就播下了令我們今天煩惱的意義混亂的種子。」因為「民族」可以被賦予多重的意義<sup>⑥</sup>：

作為民族學或文化人類學術語的民族，與在歷史學和政治學的場合講述的民族，或者現實世界中發生種種問題的民族，互相之間出現相當大的脫節。同樣一個「民族」，其概念明顯不一。

人類學者使用的「民族」，是一種注視文化的概念，而在歷史學及政治學的領域內，「民族」變成一種政治的單位。這種語義的分歧致使日本學界出現這樣的奇妙現象：許多學者為了不使人們認為成為自己敘述對象的「民族」是「只要想成為『主權國家的國民』就應該實現的一種人類集團」<sup>⑦</sup>，不得不反過來用ethnic group、ethnicity、ethnic minority等英語詞彙解釋或代替日製漢詞的「民族」。

世界沒有向「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多民族國家反倒逐漸成為世界上的普遍現象。試問，在全球化逐漸成為趨勢的今天，是否也到了該探討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國民國家，是否真的能夠體現人的本性，是否真的代表着世界的發展方向？是否真的能夠給人類帶來和平、安寧、繁榮和幸福？

如果當初不借用日製漢詞「民族」的概念，而接受法國革命的nation概念——即一種政治共同體的概念以及以這種政治共同體為基礎形成的文化共同體概念，並以其他術語另外表示類似漢族、滿族等以血緣為基礎的文化共同體的概念，那麼還有沒有日後的作繭自縛？

### 註釋

①⑩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1901），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上海：中華書局，1941），頁22。

② 〈與夫子大人書〉（光緒二十八年四月），收入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286。

③ 余一：〈民族主義論〉，《浙江潮》，第一期（1903年2月）。

④⑬⑭ 〈民族主義之教育——此篇據日本高材世雄所論而增益之〉，《遊學譯編》，第十期（1903年9月），頁2；1-2；1。

⑤⑥⑨ 〈說國民〉，《國民報》，第二期（1901年6月10日），頁8；9；15。

⑦⑰ 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節二·論國民與民族之差別及其關係〉，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頁74；76。

⑧ 〈論中國之前途及國民應盡之責任〉，《湖北學生界》，第三期（1903年3月）。

⑪⑫ 汪精衛：〈民族的國民〉（二），《民報》，第二號（1906年1月），頁4；4。

⑬⑮ 楊度：〈《遊學譯編》敘〉，《遊學譯編》，第一期（1902年11月），頁10；6。

- ⑭ 汪精衛：〈民族的國民〉，《民報》，第一號(1905年11月)，頁31。
- ⑮ 安田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觀念の形成——國民・臣民・民族〉，《思想と現代》，第31號(1992年9月)，頁65。
- ⑯⑰⑱⑲ 尹健次：《民族幻想の蹉跎：日本人の自己像》(東京：岩波書店，1994)，頁22；36；43-44；19。
- ⑳㉑ 內堀基光：〈民族の意味論〉，載青木保等編：《民族の生成と論理》，「岩波講座・文化人類學」，第五卷(東京：岩波書店，1997)，頁5；3。
- ㉒㉓ 谷川稔：《國民國家と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山川出版社，1999)，頁6-7。
- ㉔㉕ 山內昌之：〈ネーションとは何か〉，載井上俊等編：《民族・國家・エスニシティ》，「岩波講座・現代社會學」，第二十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96)，頁12；9。
- ㉖ 同註⑮安田浩，頁66；註⑲尹健次，頁39。
- ㉗㉘ 〈世界的理想と國民的觀念〉(1890)。轉引自註⑮安田浩，頁66。
- ㉙ 志賀重昂：〈《日本人》の抱懷する處の旨義を告白す〉，《日本人》，第二號(1888年4月)。
- ㉚ 方維規：〈論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與「中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2年4月號。
- ㉛㉜ 韓錦春、李毅夫：〈漢文「民族」一詞的出現及其初期使用情況〉，《民族研究》(北京)，1984年第2期，頁37；39。
- ㉝ 《時務報》，第十一冊〈土耳其論〉(1896年10月22日)，第十四冊〈俄將論中國財政〉(1896年12月15日)。
- ㉞ 沈國威等：《歐化國家を目指せ：情報發信基地としての19世紀日本——日本新聞の中國語訳を通してみた近代日中語彙交流》(松下國際財團研究助成「研究成果報告書」，1998)，頁3-4。
- ㉟ 註㉞韓錦春、李毅夫，頁39；彭英明：〈關於我國民族概念歷史的初步考察——兼談對斯大林民族定義的辯證理解〉，《民族研究》，1985年第二期。
- ㊱ 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34。
- ㊲ 註㉞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159-60。
- ㊳ 梁啟超：〈三十自述〉，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頁18。
- ㊴ 雨塵子：〈近代歐人之三大主義〉，《新民叢報》，第二十八期(1903年3月)。
- ㊵ 關曠野：《民族とは何か》(東京：講談社，2001)，頁15、213。
- ㊶ 註㉞山內昌之，頁11；註⑲尹健次，頁42。
- ㊷ 〈中國之改造〉，《大陸》，第四期(1903年3月)。
- ㊸ 張灝著，崔志海、葛夫平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頁102。
- ㊹ 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十六、十七》。
- ㊺ 梁啟超：〈答某報第四號對於新民叢報之駁論〉，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八》。
- ㊻ 〈家制と國體〉(1892)，轉引自註⑮安田浩，頁67。
- ㊼ 〈憲法の精神〉(1900)，轉引自註⑮安田浩，頁69。
- ㊽ 〈我憲法の特質〉(1902)，轉引自註⑮安田浩，頁69。
- ㊾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1995)，頁50-58。
- ㊿ 蘆谷瑞世：《新民族論》(東京：教材社，1941)，頁123。
- ① 21世紀研究會編：《民族の世界地圖》(東京：文藝春秋，2000)，頁16-17。
- ② 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布告全國同胞書〉(民國元年元旦)，載張其昀主編：《國父全書》(台北：國防研究院，1970)，頁446-47。
- ③ 王德勝：〈北洋軍閥對蒙政策幾個問題的初析〉，載《內蒙古近代史論叢》，第三輯(1987)，頁65。

王 柯 1956年生，1982年畢業於中央民族學院，1994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研究生院；現為日本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部教授。主要著作有《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研究——中國的民族與伊斯蘭問題》、《民族與國家——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等。